

崇高意韵说



九十年代文学潮流大系

90NIANDAI WENXUE CHAOLIU DAXI

李复威 主编

蒋守谦 编选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90年代文学潮流大系

李复威 主编

崇高意韵小说

蒋守谦



00136386



石化 S136386C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崇高意韵小说/蒋守谦编选.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9

ISBN 7-303-04992-4

I. 崇… II. 蒋…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5408 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出版人: 常汝吉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mm×1 168mm 1/32 印张: 16. 875 字数: 423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 000 册 定价: 26. 00 元

总序

□李复威

二十世纪的历史帷幕正徐徐落下，在世纪之交之际，文坛沉浸在回眸与前瞻的思考的氛围之中——总结这一世纪文学演进的成果和经验，展望下一个世纪文学发展的前景。九十年代的文学情境已自然成为百年来的最后一道风景线，其独享天时、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关注和兴趣。

—

也许是经历了多年的实践的检验，在尊重文学自身特点和规律的呼吁下，文学界逐步摒弃了编写、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以政治变迁为依附的分期方法，渐次树立起“世纪意识”与“十年节奏”的发展观。十年，虽然时限比较短暂，虽然起始和终结的界限难

以泾渭分明，但是，它往往能够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生态环境，呈现出某种联通共存的凝聚性和沉浮变衍的阶段性的。德国作家歌德说过：“时代给予当时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真可以说，一个人只要早生十年或迟生十年，从他自己的教养和外面的活动看来，便成为全然另一个人了”。文学情况亦然。这种“十年节奏”的确立，为我们采用编年史式的文学进程的研究奠定了共识的基础。

对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成果的评估，人们一直习惯于将刚刚逝去的前一阶段作为最初的参照系，总是希冀能从中看到某些新的因素、新的发现、新的生长点和新的发展源。这样，文学界顺理成章地热衷于进行着九十年代文学与八十年代文学的比较、对照。这种运作的初始，往往会使人陷入一种犹豫的心态和尴尬的局面。

毋庸置疑，八十年代是我国二十世纪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活跃期、激变期、繁荣期。它走出了历史的泥泞，经历了“伤痕”、“反思”、“改革”等一个又一个文学热点的转换：从创作的复苏到文学的振兴；从步调整齐的轰动效应到旋律驳杂的声部交错；从文学之门的开启到各种外国艺术潮流的全面引进；从创作倾向的多样化到美学思潮的多元化……有的评论家甚至断言，我国这十年的文学道路大致走过了西方文学一百年的演进历程。当年名家迭出、佳作涌现，出现过尊重作家、珍视文学的浓烈的社会氛围和超强的价值观念，如茅盾先生所言：“……大河上下，长江南北，通都大邑，穷乡僻壤，有口皆碑”。尽管八十年代文学尚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它无疑为九十年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当高的历史起点。

九十年代初期的文学态势与八十年代后期并无鲜明的界线。许多重要的文学特点和现象都是顺势沿袭过来的。由于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而呈现出的“文学圣殿的倾斜”、“作家光环的暗淡”、

“轰动效应的失却”等还有增无减。一时间作家圈内，有的辍笔、有的改行、有的下海……令人困惑不解。文学创作的纷纭之态也达到“乱花迷眼”的程度。铺天盖地而来的通俗文学几乎将严肃文学排挤得无容身之地。难怪当时有的评论家一度以“衰落”、“危机”、甚至“死亡”等极端化的字眼表示出严重的忧虑。及至九十年代中叶，经过一阵混沌状态之后，文学情势方逐步显露出一些独立的品格和异样的气质。

二

世界冷战局面的结束及多极化格局的出现，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信息化社会的日益强化，国际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以及全球化趋势的出现……形成九十年代文学演进的大时代条件。而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确立，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观念的不断深化，图书竞争市场新格局的出现，作家写作方式的现代化改善，文化传媒手段的丰富化……造就了九十年代文学存在的具体的生态环境。这一切因素无疑制约了这十年文学的发展轨迹和总体构架。

近些年来，社会经济的大转型引起了人们生存形态、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思维习惯、文化需求和审美趣味的变衍。这些变衍一直还处于追寻、比较、探索的时期，还没有获得稳定的、规范的价值定位。文学的发展同样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身不由己地接受着方方面面更多的、更复杂的、更微妙的挑战。在文苑内外，见仁见智的歧义、不同看法的矛盾、各自好恶的差异……司空见惯，俯拾即是。这样的态势恐怕会持续到下一个世纪。而处于转型期磨合阶段的九十年代文学只能在无序中的梳理、驳杂中的筛选、困惑中的反思中，日臻显现出自己清晰的形象。

面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转型，九十年代文学的生存策

略必须是、也只能是及时地趋时应变。其最突出的标志就是，在美学意义上的文学多元格局在八十年代的基础上又向前迈出了平实的、稳健的一步。人们一直认为可能属于短暂性质的多元形态逐步走出了幼稚阶段。在九十年代的中晚期，我国文学的总体格局构筑成了一个吸纳多元、展示多元、标准多元、竞争多元、互补多元、发展多元的开放体系。这其中，有宽容和理解，也有争议和撞击；有独立的宣言和自我的领地，也有相互的渗透和局部的重叠。同存共荣是凝聚多元的目标与追求。这是令人欣喜的开放体系——我们的文苑真正出现了百鸟欢叫、百树争荣、百花竞开的局面。如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所言：“百种禽鸟鸣叫各自的音调，而不是同种的一百头禽鸟比赛同一音调的嗓子谁高谁低”。这是来之不易的开放体系——它不仅是文学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结晶，也是文学经历种种曲折坎坷后的经验总结，是文学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社会需求的必然产物。这是渐趋成熟的开放体系——它随着时代的演进和文坛的实际不断地平衡着、调整着文学发展种种轻重缓急的关系：切近现实与美学探索，追求理想与适应现状，市场色彩与艺术品位，教化功能与娱乐作用，大众水平与超前意识，继承传统与借鉴西方，主旋律与多样化，民族化进程与同世界文学接轨……

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行，社会的竞争意识和竞争机制在各
部门、各行业、各个领域也纷纷健全和完善起来，为发展社会生
产力而竞争，为推动时代进步而竞争，为激活、调动人的积极性和
创造力而竞争，自然成为九十年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本质内容，
也成为文学创作主题内质的基本要素。反腐倡廉文学、改革文学、
都市文学、乡镇文学、社区文学……都在这一中轴线上寻觅到自
己倾斜的重心。由此而产生的种种人生的活剧、情感的波澜、人
性的开掘等都悄然发生着前所未有的艺术表现的特征。

三

多元格局的开放体系的形成，给九十年代文学带来了一些引人瞩目的新质。在相当数量的先锋文学作家创作纷纷转向之后，九十年代中期，一股势头强劲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显示出创作的活力。一批立足于社会生活底层的中青年作家，积极关注当今转型期现实的热点问题，以平民的意识去探求、思考改革中的种种无奈和隐患，表现出分享艰难的主人翁意识和参与精神。尽管这些创作还有不小的缺憾，但其反拨的意向和冲击的效果是有启示意义的。联系到当前世界文坛上的回归社会现实、回归文化传统的潮流的涌现，这股冲击波无疑还给我们提供了颇有价值的文学发展的信息。

随着我国现代化大都市的建设和都市人职业结构的变衍，原有的以小农经济形态为背景的市井文学和工业题材文学在名副其实地向现代都市文学转化。渐趋浓郁的都市文化意蕴，日益绚丽的都市生存景观，全面开放的都市文明观念，愈显个性的都市风俗世情……交织构成都市文学的创作特色。都市规模的宏伟化、社会消费的超前性、金融意识的成熟度、科教地位的尖端性，以及都市人的新的人际矛盾、欲望追求和精神困扰……给都市文学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传统意蕴最为浓郁的乡土文学，也因为乡镇工业的发展、城乡交流的加强和农村人现代意识的进步而开创了前所未有的进程。

八十年代中期已展露丰采的女性文学演进至九十年代，由于一批晚生代女作家的加盟更显出骄人的成绩。三代人顺承的女性作家汇集成阵容强大、实力雄厚的创作集团，同时在小说和散文两大领域中纵横驰骋。这在一向以男性作家占据统治地位的古今中外文学发展史上实属一道罕见的景观。

被人们称为“时代的纪念碑”和“文学的重型武器”的长篇小说在九十年代创作数量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平均每年八九百部的数目已相当于建国后十七年长篇小说创作的总和，创下历史上的最高纪录。可惜的是精品力作不多。当然，也有少量积作家毕生精力和全部心血而成的巨制，显示出难得的经典风貌和史诗气魄。杰出的长篇小说往往是文学发展成熟的优生儿，是一个文学时代的重要标志。众多作家正在为这样的作品的诞生辛勤地笔耕着。另外，九十年代的学者文学在散文园地上成绩斐然。他们重点以随笔和杂感的形式领悟人生、反思历史、探求哲理、针砭时弊，表现出激情的深沉和睿智的超越。其它还有以创造性的虚构化写作而形成的现代寓言文学，以表现人物心理流变而见长的情感分析文学，以现代思维探险熔铸而成的幻想文学等，也都日渐成为九十年代文苑的一朵朵奇葩。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雅文学与俗文学二者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走向。它们自身都在进行着一次大调整。出于生存竞争和发展自我的需要，彼此都发现对方有值得汲取的“营养素”。两者从疏离渐渐趋于合流。特别是一些雅文学作家开始从“高雅的创新”和“超前的试验”，转向“雅俗共赏”的美学追求。应到看到，九十年代的这种雅俗互补、乃至合流的势头是时代条件、社会国情、文化状况和文学规律共同促成的一种综合效应。雅俗互补、合流并不是在二者之间求得一增一减的平均值，而是共同获得一个再提高的基点，在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内，相对出现的合流又会在新的文学生态环境中出现疏离，在先锋文学的创新中渐趋分化。这个周而复始的螺旋式的演变过程，也就是文学进步、升华的过程。

与八十年代比较起来，九十年代相当数量作家的心态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调整——调整自己与变幻不定的种种文学思潮的关系；调整与不同观念和个性的各种类型作家间的关系；调整与层

次各异、趣味有别的不同的读者群的关系；调整与频频变异、难以捉摸的图书市场的关系……在适应多元格局的竞争态势下，求得自我的定位生存和不断发展。浮躁之气渐少，平实之风益多；急功近利之态渐弱，潜心创作之心益强；玩文学的气氛渐淡，职业的敬畏感益浓。尤其是一些个性突出、风格鲜明、勤于探索的作家，在争奇斗艳的美学园地中反复采撷，含英咀华，深层次地把握文学的特点及规律，从群体性走向个体性，从代言人走向自言人，从共语式走向独语式，以私人的角色选择，表达生命的独特冲动；用自我的异样感受，领悟人生的内在奥秘；在个体的精神家园内与心路历程中，寻觅到自己与世界对话的特殊语境和模式，从而进一步展示出艺术的本色魅力，充分发挥其在真、善、美领域内的潜移默化的功能。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标示出九十年代文学创造自己优势的契机，播下未来希望的种子。

四

从传统型文学向现代型文学过渡，从闭锁型文学向开放型文学过渡是二十世纪我国文学演进的总轨迹。在百年来的漫漫历程中，文学经受了阶级搏杀的磨砺，革命烽火的洗礼，反抗侵略的锤炼，新旧转折的欣喜，文坛左右的纷争，百花凋零的浩劫、吐故纳新的探索……时至今日，世纪末的九十年代文学尚不能给这个过渡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趋时中固有的芜杂，多元中兼存的混沌，发展中显示的无序，创新中蕴含的浮躁……仍然表明九十年代文学在这个历史的转变中的不成熟性和未完成性。当然，九十年代文学毕竟从五六十年代的政治制约中取得了经验，从七十年代文学的衰败中总结了教训，从八十年代的轰动效应中得到了启示，多了几分主见和豁达。它一方面在社会全面走向市场、文学的生态环境和价值取向发生急速变化的情势下，找准自己的角

色定位，别无选择地趋时应变，求得必要的生存权；另一方面在传统地位余波的影响下和现时变革的适宜的机遇中，翘首前瞻，蓄势待发，把希望和辉煌更多地留给明天。

法国伟大的文学家雨果说过这样一段蕴意深邃的话：“旧时代的庞大的文化遗物证明，建筑术上最伟大的作品，与其说是个人的创造，不如说是全社会的劳作；与其说是天才光辉的闪耀，不如说是人民创造力量的结果。这是各个民族的遗产，多少世纪留下的积层，社会逐渐蒸发的结果所形成的结晶。一句话，这是特种的有机结构。时代的每一个浪潮都在文化遗物上留下自己的冲积土，每一代都留下自己的一层，每一个人都填上自己的石块”。这段话同样表明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程序，启示我们深入思索二十世纪及九十年代的创作业绩和历史地位。历史以前所未有的青睐赋予二十世纪特殊的魅力：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席卷全球的世界大战，技术革命带来的经济腾飞，科学进步促使人类文明的跃进，现代意识在精神领域中的全面觉醒，世界政治格局的无穷变幻，人类多领域的一体化趋势……处于世纪末这一特殊阶段的九十年代文学无疑也会在我国文学的“积层”上留下自己的“冲积土”——适应现代社会生活节奏、适应现代经济和科技发展趋势、适应现代人的观念意识、思维方式和审美趣味、适应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眼下，它还算不上是色泽清晰、层次分明、构造凝聚的优质土层，但它却是为下一个世纪文学发展而铺垫的饱含着多种多样营养素的底肥。在这一点上，我想它是不会推卸责任和自惭形秽的。

十年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近四百万字的《八十年代文学新潮丛书》。这套选本以十年为期，筛选梳理形形色色的文学思潮并加以评估，其欣赏的作用、总结的意义和资料的价值得到了海内外文学界的高度评价和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丛书很

快销售一空。一九九二年增编再版一次，仍供不应求。

当代人总结同步趋进的当代文学，固然有历史沉淀度和能见度不够的局限，但也具备自己的优势：最熟悉文学演进的时代氛围和社会态势，最了解作家的创作道路和心曲隐衷，最能体察当代读者的审美流向和阅读趣味。这种及时的、初步的研讨，一方面对作品的现实价值作出第一手的评判，另一方面也给后世研究这段文学史留下当代人的真切感受和翔实信息，给未来的历史裁决提供新鲜的素材，无疑是应该受到重视的。

九十年代即将结束，该出版社又以令人钦佩的更大魄力和更多投入，决定将这总结十年文学进程的“传统工程”继续下去，筹划出版了这套十八册近七百万字的《九十年代文学潮流大系》。从八十年代的“新潮”到九十年代的“潮流”，这称谓上的更换也标示出这两个十年文学态势上的某些差异。九十年代的众多作品群，往往徘徊在文学现象与美学思潮之间。比一般的“现象”似乎多一点集中的倾向性，较之“思潮”仿佛又欠缺一些必要的艺术哲学的根柢，故以“潮流”命名之，较为妥帖。或以题材分类，或以形式归纳，或以方法集中，难以强求一致，只得不拘一格，恐怕也只有如此方能全面展示九十年代多元文学的真实形态。此次有幸请到众多著名的作家和评论家参与编选，保证了丛书的品位和质量。

当前，我国图书市场上的“选本热”仍居高不下，且有过多过滥、冗杂重复的倾向。许多读者对此也产生了一种逆反的心理。我想，这并非是选本样式自身存在的问题。古今中外，文学的选本是从未间断过、也不可能间断的。选本的角度新颖，选家的慧眼独具，能取所需于一册，览精华于一体，恐怕是选本成功与否的关键。这无疑是出版界共同努力的方向。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套书所选均属九十年代内书报杂志上公开发表过的作品。鉴于篇幅的缘故，所选作品以中篇、短篇

为主，有关的长篇只得割爱。作品原则上以发表时间前后为序排列。个别选本因内容需要未按此例。有的应入选的作品因作者授权问题未得顺利解决而未能选用。

如果我们的这种努力能为九十年代文学的梳理和总结作出一点微薄的贡献，那就会感到十分欣慰了。

一九九九年二月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序

蒋守谦 □

崇高就是“伟大心灵的回声”。

——郎加纳斯《论崇高》

九十年代初，中国文坛曾发生过一次关于崇高在当代文学中地位和意义的论争。论争的主要问题有二，一是崇高是不是社会主义文学的“基本的美学形态”^①；二是如何看待像王朔这样的作家在创作中“躲避崇高”的价值取向^②。争论虽然没有充分展开，也未能争出个大家都能认可的结论来，但却不无意义。它至少向我们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即：崇高问题是九十年代备受人们关注的一个既有现实意义又有理论意义的美学问题。在研讨九十年代中短篇小说的崇高主旨和美学形态时，我们也可以从这场论争中得到不少启发。

这里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理解崇高的含义。

在中国现代美学和文艺理论中，崇高这一概念，与典型、悲剧、喜剧、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概念一样，本源于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中建立起来的人本主义思想和美学体系。按西方美学，崇高有其特定含义。从公元三世

① 参见1991年4月25日《人民日报》，1992年8月1日、8月29日、9月26日《文艺报》。

② 参见丁冬、孙珉选编《世纪之交的一次冲撞——王蒙现象争鸣录》（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一书中围绕王蒙的《躲避崇高》的争鸣文章。

纪古罗马学者郎加纳斯在其《论崇高》^①一文中称崇高为“伟大心灵的回声”，并将之作为一种普遍、永恒的修辞风格提出后，千余年间，经美学家们不断探讨，在十八世纪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柏克和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黑格尔的美学理论中，终于被作为一个与一般的“优美”相对应的美学范畴、美的形态确定下来。崇高这一概念被介绍到中国后，中国美学家又结合我们民族艺术的传统和实践加以研究，做出阐发。很早以前朱光潜先生就曾指出崇高作为美学概念的汉语翻译不甚确切，他倾向于用“雄健”、“刚性美”来表达这一概念的原义。可能是因为约定俗成之故，目前出版的美学著述一般仍沿旧例，只是在阐发时见解略有差异而已。大致说来，国内美学家还是把崇高与优美作为两个对应的概念来对待的。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云：“优美作为美的一般形态，侧重于客体与主体在实践中经由矛盾对立达到统一、平衡、和谐的状态。崇高则不同，它主要体现实践主体的巨大力量，更多地展示着主体和客体在现阶段相冲突和相对立的状态；并且在这一对立的冲突中，显示客体和主体相统一的历史必然性。”^②这可以作为我们考察九十年代小说崇高题旨和美学形态的一个理论参照，但不宜按图索骥。这是因为：第一，文学创作比抽象的理论概括，情况要复杂得多。第二，我国文学历来就有崇高、刚柔相济的“中和”境界的传统，这个根深蒂固的传统或显或隐地作用于当代作家的创作。九十年代小说固然存在着按美学形态可以明确地划入崇高范畴的作品，但也有不少表现了政治、伦理道德上的崇高精神、其美学形态既不宜归入崇高，也不宜归入优美的作品。第三，无论是作为主题意蕴的还是作为美学形态的崇高，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几年间，它们都曾被一些具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家作为自己创新过程中应该加以“躲避”的对象，而显得落寞。进入九十年代，崇高既是作为一种刚健、雄奇的美学风尚也是作为超凡脱俗的文学主题出现在小说园地里的，与其

① 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版。

② 见《美学概论》第49~50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版。

他种种创作潮流相比较，这也可以视为特定条件下形成的一股创作潮流。我们要谈论的就是这个潮流。

这股创作潮流不是偶然出现的。在论及文学历史的形成时，别林斯基说过这样的话：“任何有机的发展都是通过进步来完成的，只有具有自己底历史的，才能有机地发展；只有每一个现象都是先行现象的必然结果，被先行现象所解释的，才具有自己的历史。”^① 我以为，九十年代小说里的崇高，就是一种可以用它的“先行现象”来解释的历史现象。

新时期文学是从恢复被“文革”破坏殆尽的我国新文学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开始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初潮，人道主义、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构成了它的思想基调。就总体而言，这个时期作家的创作动机和作品的客观效果，都在于激发读者崇高的思想情感。有些作品，如王蒙的《布礼》、《蝴蝶》，宗璞的《我是谁》、《蜗居》，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等，运用西方现代小说的意识流结构，描写极左路线蹂躏下的荒诞世态和心态，对多年来趋于凝固的小说模式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但仍止于形式和技法。在传统的人本主义的伦理道德观念上，他们非但没有“躲避崇高”，相反，恰恰是用革命的传统因而也可以说是用崇高的思想来揭露、谴责造成荒诞世态、心态的极左思潮和极左势力的。“布礼”一词本身就充满了崇高的意味。

但是待至八十年代中期，情况变了。这种变化有其必然性。“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在七八十年代之交次第迭出，红火一时，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便面临着如何深化、如何创新的问题。这个时候，文学已经无需服膺“为政治服务”的律令，不必再充当“阶级斗争的工具”。特别是随着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全面实施，西方和拉美的各种现代文化思潮和文学流派纷纷被介绍进来，于是小说观念、小说模式便由单一而走向多样。传统的现

^① 《1847年俄国文学一瞥》，《别林斯基选集》（二）第380页，时代出版社1953年1月版。

实主义受到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尖锐挑战。“新潮”澎湃，新在哪里？新就新在用西方现、当代哲学和美学观点来表现人性的异化、人性弱点、人的生存困境和生存的尴尬，用非理性代替理性，等等。这当然就要“躲避”以人本主义为思想根基的文学中的崇高。无论是刘索拉、徐星小说里表现的那些失去了价值规范的年轻人的精神迷惘和灵魂躁动，还是残雪小说里那种交织着惊恐、嫉恨、乖戾、焦灼的梦魇般的情境；无论是莫言呼唤野性，还是洪峰的“审父”意识，我们从中能够感受到的主要是主客体冲突所激发出来的那种与传统价值观念和现存精神秩序格格不入的思想情绪和非理性激荡。莫言小说《红蝗》里有言：“人类区别于动物界的最根本的标志就是：人类虚伪！”这种片面性，充分地反映了现代主义文学力图逼视人性弱点的价值取向，因而也就注定了它与传统的伦理道德上的和美学上的崇高的对立。被称为“后新潮”的一批作家作品，更以远离现实、消解意义、“拆除深度模式”、制造“叙事迷宫”，也就是搞形式主义的“文体实验”为能事。对“后新潮”小说，一般读者的反映，是“看不懂”。一位评论家指点说：“老派小说读意义，新派小说读句式”。这是个很机智的概括。只是，既然连作品的意义都不能顾及了，遑论崇高？！

在对待崇高的态度问题上，“寻根”小说和“新写实”小说其实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躲避”的倾向。为了追求小说的新境界，一批青年作家立意要从我们古老的民族文化传统中去“寻”文学的“根”，其实也就是用更具现代哲学意味的文化观点取代以往所惯用的传统的政治、道德观点。文化观点并不一概排斥崇高，但常常不以崇高为追求的目标。这可以从“寻根”小说的一些名篇中得到证实。比如韩少功的《爸爸爸》，小说里的鸡头寨人对丙崽这个怪物所做出的种种反应（如“打冤家”之类），固然也透露出失落在湘西蛮荒地带的古老的楚文化的雄浑和壮烈，说它具有崇高的特色也未尝不可；然而作者没有到此为止，而是要让人感到，这种雄浑壮烈的文化一旦陷于封闭状态，将会变得多么愚昧和荒诞。同样的，王安忆在《小鲍庄》里揭示的那种从古到今传承不息的“仁义”精神，既是生活中见义勇为、舍己为人的英雄壮举